

胡和平 著

公安司法口才与技巧

GONGANSIFAKOUCAIYUJIQIAO



中南大学出版社

PDG

前 言

半个世纪以来,从事公安工作的人民警察在维护共和国尊严、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承担着共和国卫士的神圣职责,发挥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蓬勃开展,人民警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也对人民警察队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民警察要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正确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具备执法如山、廉洁奉公的政治素质,千锤百炼、智勇双全的业务素质,沉着冷静、洞察入微的心理素质,博学多才、一专多能的文化素质,体格强健、能征善战的身体素质。由于人民警察所从事的司法活动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活动,必须与社会中的各种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就要求人民警察还必须具备较强的社会交际能力,特别是口头表达能力,即出色的口才。一般而言,会说话的人比较会办事。当今社会,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出口成章的人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固有的优势,产生出智慧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说话的艺术和技巧的口才——口头交际能力既影响着个人事业,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因此,提高口头表达水平或口语交际能力成了时代的需要,也成为人们适应乃至胜任本职工作的需要。

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社会各领域的人们总结古今中外的口才经验,研究口头表达的技巧,以提高自身的口语交际能力和口头表

达水平,不断有宏观通用口才和微观行业口才的研究著作面世。公安民警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和被害人、管教各类违法犯罪人,还是出庭参与行政诉讼、调解治安纠纷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以及从事其他公安业务活动,都离不开较高的司法口语表达能力与技巧,即公安司法口才。公安司法口才因其主体、内容、对象以及运用时间和空间的特殊性而与其他行业口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有其自身的方式、规律和技巧。研究并掌握这些方式、规律和技巧,对于从事公安工作的人民警察在司法活动中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巧妙施展司法口才,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安司法口才与技巧》是作者多年来对上述几种主要公安司法口才形式观察和研究的心得总结,希望能对战斗在司法第一线的公安民警提高口语表达水平有所帮助。

本书撰写参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得到了公安司法部门人民警察的帮助。中南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纰漏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作者

2003年3月于长沙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口才概说	(1)
第一节 我国口才发展简介	(1)
第二节 口才在当今社会的作用	(8)
第三节 口才在司法领域的应用	(11)
第二章 公安司法口才的基本方式、技巧与要求	(16)
第一节 公安司法口才的基本方式	(16)
第二节 公安司法口才的基本技巧	(37)
第三节 公安司法口才的基本要求	(45)
第三章 侦查讯问的口才	(51)
第一节 侦查讯问口才的概念和特点	(51)
第二节 侦查讯问口才的技巧	(54)
第四章 调查询问的口才	(86)
第一节 调查询问口才的概念和特点	(86)
第二节 调查询问证人、被害人口才的技巧	(89)
第五章 法庭辩论与法庭演讲口才	(103)
第一节 法庭辩论口才的概念和特点	(103)
第二节 法庭辩论口才的准则和技巧	(106)
第三节 法庭辩论口才的作用和要求	(110)
第四节 法庭演讲的艺术技巧	(113)
第六章 公安调解的口才	(124)

第一节 公安调解口才的概念、特点和原则·····	(124)
第二节 公安调解口才的技巧与要求·····	(127)
第七章 管教人员的口才·····	(131)
第一节 管教人员口才的概念、特点和要求·····	(131)
第二节 管教人员常用的几种口才类型·····	(135)
第三节 管教人员口才技巧·····	(140)
第八章 公安司法口才的机变·····	(145)
第一节 公安司法口才机变的原则·····	(146)
第二节 机变在公安司法口才中的地位·····	(154)
第三节 几种特殊情况的机变处理·····	(160)
附：律师执业的口才·····	(168)

第一章 口才概说

第一节 我国口才发展简介

口才,就是说话的艺术和技巧。它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最基本的口语表达能力。一般而言,会说话的人就比较会办事。因此,我们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需要好的口才。在人类发展史上,语言先于文字,口头语言先于书面语言,说话的艺术和技巧早于写作的艺术和技巧。从口语到文章,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单纯就口语的发展而言,又是从简单到复杂,从简单的音节、少量的词语,发展到一次说话运用若干句子表达复杂的意思。人类的口才就是这样不断演变发展起来的。

我国口才的发展有文字可考应该从《尚书》开始。《尚书》中记言的共有二十四篇,记载并保存了夏、商、周时代口才发展状况与水平。其中以《甘誓》为最早,它是夏启出师讨伐有扈氏的誓词。

嗟!不事之人,予警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之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这篇誓词,言辞简洁,结构完整。从文字来推断宣誓时的语气,也是斩钉截铁,强劲有力。而后面的《盘庚》应该是篇幅最长的最精彩的演讲词;周的《无逸》则是一次生动精彩的谈话记录。从《尚书》

记言的二十四篇我们不难发现,口才在夏、商、周时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历史推进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列国纷争,政治斗争尖锐,学术百家争鸣,口才从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我国口才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政治斗争的异常尖锐,造就了苏秦、张仪等大批游说之士的横空出世。他们不仅会权谋机变,而且都能言善辩,形成了当时所谓的“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的局面。苏秦作为一个普通的辩士,凭借自己的智慧权谋和雄辩的口才,佩六国相印,联合除秦国以外的六国诸侯,共同抗击和抵御强暴的秦国,使“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仅此一例,就足以看出口才在当时的水平。学术争鸣,也极大地推动了口才的发展,促进了口才的繁荣。“九流十家”,先秦诸子,绝大部分都是能言善辩的人才。他们一方面想方设法使自己的思想与学说在政治上得到实施,周游列国,遍访诸侯;另一方面又要和不同的学派展开论争,从而直接促进了口才的发展。在诸子百家中,孟轲是历来人们公认的雄辩家。孟子一方面拜谒梁惠王、齐宣王等,用自己的辩说恳请他们采纳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又以自己锐利的谈锋驳许行、避杨墨。其他各家也大致如此,形成一种与张仪、苏秦等游说之士不同的学术论辩口才。

以上所及,还只是口才发展的主流。其实在这个口头语言与书面创作语言交替的时代,善于雄辩、长于口才的人远不止这些游说的辩士和论辩的诸子。如《左传》中的《烛之武退秦师》、《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鲁仲连义不帝秦》、《触龙说赵太后》以及《国语》中的《召公谏弭谤》等等所写的主人公既不是游说辩士,也不是学术诸子,但他们的说辞却“言皆可讽咏”,是非常精彩的辞令。

在春秋战国时期,口才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即人们对口才技巧的高度重视。表现在修辞上大量运用比喻、夸张和反

诘；篇章结构上注重铺陈排比，纵横捭阖；逻辑上推理缜密；以及提炼精要语言，运用典故寓言等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特别是寓言的运用，炉火纯青。这些寓言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说服力，深奥的道理往往通过一个寓言就能简洁深刻地阐发出来，深入浅出。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揠苗助长”、“鹬蚌相争”、“买椟还珠”等寓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言谈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而先秦典籍也被后人视为一座寓言宝库。

这一时期，口才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口才理论的发展与丰富。在春秋时期及以前，书面语言还没有大的发展，人们更重视口头语言，也重视口头语言的训练。《礼记·文王世子》提出“取贤敏才”，“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三者而一有焉，乃进其等”。孔子教学生德行、言语、故事、文学四科，并且培养了宰我、子贡这样具有雄辩才能的杰出弟子。战国时期也是如此。荀子提出“君子必辩”，而苏秦的成功本身就说明了口语训练的重要性。《战国策》记载苏秦说秦王失败后，狼狈不堪：“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金之绝，去秦而归，縲滕履赭，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黎黑，状有愧色。”回到家里，“妻不下纆，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夜发书，陈箠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期年，揣摩成”，见说赵王，取得成功。故事中的“揣摩”，固然包含了苏秦苦心研究政治策略，同时也提示了苏秦对游说方法的研究和口才的训练。正因为当时的人们重视口才与口才训练，所以，有关口才的理论在这一时期也适时地发展起来。《易经》最先提出“修辞立其诚”，主张说话要诚实，有诚心，说真话；并进一步对人们从各种不同心态出发的说话作了具体分析，“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孟子把自己辩论的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养气，养其浩然之气；二是知言，诂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

遁辞知其所穷”。而墨子不仅从逻辑学的发展上推动了口才理论的发展,而且还提出了宣言的原则和标准——“三表”。他主张立言要有所本,即“有本之者”;要从实际出发,即“有原之者”;要考虑客观效果,即“有用之者”。另外,墨子还总结出辩论中常用的几种推理方法:推,推求,即由已知的事物推出未知的事物;辟,譬喻,即借用具体的事或具体的物来说明另一件事或某个道理;侔,即用同样的东西直接说明论点,进行直接推论;援,即援用前例或对方所说的话作为类比推理的前提。到战国末期,韩非子也在口才理论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说难》中专门剖析了游说中如何掌握对方的心理进行有的放矢的游说,其剖析精细详尽,是一篇非常好的口才心理学文章。

口才的发展落后于书面语言的发展是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之后出现的新局面。由于国家统一,君主尊严,独尊儒术,加上书面语言的迅速发展,士大夫像战国时期那样向君主骋词腾说的局面已然不复存在。正如《史通》所言“逮汉、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时。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在士大夫中,口头语言在很多场合被书面语言所取代。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当然,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口才发展完全停滞不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封建士大夫也不乏能言善辩的人才,既有辩才无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有高谈阔论、语惊四座的文人、学者。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学术辩论也举行过数次,如《盐铁论》中记载的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全国文人、贤良六十余人,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等关于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问题的论争;《白虎通议》记载的公元前79年汉武帝在白虎观大会群儒对五经同异的讨论;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招集名士萧衍、沈约等与范缜关于神灭和神不灭的争论;朱熹、陆九渊于1173年在信州鹅湖寺举办的哲学辩论

等等。但是这些辩论都不可能具有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性质,所以只能是如刘知己所说的“小辩”了。

应该说,从汉初到三国,口才的发展还是较为正常的。特别是汉初,在以陆贾、贾谊、邹阳、枚乘、晁错等为代表的许多人身上还可以见到战国时期的遗风。陆贾两次出使南越,两次都说服了南越王尉佗臣服于汉;后来又为陈平出谋划策平定诸吕。贾谊在二十岁时,就已具备雄辩的口才,“每诏令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在三国时代,社会动荡,天下三分,但是时势造英雄,呈现出人才辈出的局面,许多政治家、军事将领都兼擅口才。诸葛亮隆中三分决策、赤壁之战的联吴破曹,既体现了他的政治军事韬略,也表现了他杰出的雄辩口才。其他诸如荀彧、贾诩、郭嘉、王粲、刘楨、庞统、秦宓、蒋琬、周瑜、鲁肃、虞翻、陆逊等人无一不是口若悬河、善于言语应对的人才。

魏晋南北朝时期,口才的发展脱离了正轨,误入歧途。这一时期的口才绕过实用,步入清谈,不说世事,专谈玄理。在诸多清谈家中也有很高的辩才。如王衍就称赞郭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这些清谈家的谈话,对答机智,中藏锋颖。有的凭借伶牙俐齿互争高下,有的巧言阿谀来博取权贵的欢心,有的则用华美的言辞掩饰自己的尘俗,还有的机带双敲给对方以讽刺,却又处处保持士族的高贵身份,显示名门高第的文化教养。不可否认他们的口才技巧很高,值得学习;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清谈能废事、误国,是口才发展的一大误区。

隋、唐两朝,随着经济的繁荣、都市的发展,口才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口才的运用不再局限在士大夫的范围,而是在民间蓬勃发展。由于佛教、道教的盛行,出现了僧尼、道士讲经布道的口才新形式,即“俗讲”。韩愈在《华山女》中栩栩如生地为我们描述了佛、道两家比试俗讲的热闹场面。佛、道二教讲经布道的较量,实际上就是口才的较量。俗讲后来又发展成为讲述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

的变文。这些变文有的体制宏伟,描绘生动,辞采俊丽。

宋朝沿袭唐以来的民间口才,出现了所谓的“说话”。“说话”分为四科:讲史,说经诤经,小说,合生。这种“说话人”的组织叫做“雄辩社”。到明清时期,“说话”又发展为弹词、说书等等。柳敬亭就是当时著名的说书艺人。

无论是隋唐的俗讲、变文,还是宋朝的说话抑或是明清的弹词、说书,都只是民间口才发展中的一部分。在民间口才中更重要的部分是政治斗争口才及其发展,如宋元明的农民起义,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抗英斗争等等,都涌现出不少长于口辩的人才。如较为完整地收录在容斋逸史《方腊起义》中的方腊演说,以小喻大,由近至远,层层深入,夹叙夹议,饱含真挚感情,鼓动性强,说服力大,将其置于世界著名演说之林,也毫不逊色。

尽管在封建社会,口才的发展走过了一段蜿蜒曲折的路,但是,当历史车轮驶入 20 世纪,随着革命大潮的风起云涌,口才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

早在辛亥革命前,演讲和辩论就蔚然成风。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资产阶级思想家、宣传家章太炎和革命家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徐锡麟、秋瑾等人都是演讲的高手、论辩的巨擘。特别是孙中山先生,一生中作了无数次演讲,他以革命先行者的远见卓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雄辩的口才,鼓动革命,唤醒民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的演讲中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读这样的演讲词,不仅能让今天的我们领略孙中山先生当时大气磅礴的演讲风采,而且同样能够振奋精神。

1915 年开始的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封建文化,口才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袁

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倒行逆施,竟然准备接受日本政府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演讲。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大游行;天津、上海、长沙、济南、广州、南京、杭州、开封、南昌、成都等大中城市的学生,都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发表宣言、演讲。6月初,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发展成为广大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这个时期暴风骤雨般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斗争极大地推动了口才的发展,涌现出像李大钊、陈独秀等大批杰出的革命演说家。此外,工人运动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口才的群众性普及与发展。上百次的罢工、集会和演讲,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也培养了工人阶级的口才。在他们当中出现了高明的演说家和谈判能手,在口才发展的队伍中增添了一支新生力量。

“五四”时期,口才的发展盛况空前,并呈现出三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第一,口才的发展与爱国精神的昂扬和民族精神的振奋紧密结合起来了。广大革命者把口才作为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和发扬民族正气的武器,演讲词都有一种大气磅礴、昂扬向上的精神。

第二,口才获得广泛、深入的发展,演讲由“沙龙”走上社会,深入群众。会议、学校、街头、庙会、集市都成为讲演的场所;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都成为演讲家或即兴演讲者。

第三,演讲组织纷纷成立。1919年3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利用庙会等群众场合,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封建文化。从这一组织开始,以后各地纷纷组织讲演团,一些研究会、社等团体,实际也带有口才、讲演训练的性质。

第二节 口才在当今社会的作用

社会越发展,口才就越显重要。当今社会,有人甚至将舌头与金钱、电脑并列在一起,合称为当代国际斗争的“三大战略武器”。国际斗争尚且如此,在其他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又何尝不是这样。当今口才的发展,除了方式、技巧的精进外,它的广泛性已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政治风云中的舌战、经济开拓中的公关、社交往来中的交流、科技文化的推广、生活用语的关怀、司法工作中的公正等等,都是口才广阔的用武之地。

政治斗争历来是口舌角逐的场所。与以往不同的是,当今的斗争比以往更为复杂多变,且更多地集中在国际方面。无论是国际会议、国际谈判,还是答记者问等其他一些外事场合,无一不是唇枪舌战的阵地。在国际会议上,一次精彩的演讲,可以张扬国威,赢得朋友,获得支持,折服对手,如周恩来总理 1955 年出席万隆亚非会议时的演讲,就在亚非国家面前树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光明磊落的形象,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和普遍的赞赏与支持,对万隆会议取得成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谈判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肉搏战,交锋是面对面的、直接的,更需要随机应变的口才。周恩来总理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在他的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次谈判,遇见过多少难以应付的对手,但他一次次地胜利了。中美恢复邦交的谈判、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都是谈判中的激流险滩,周总理都一一轻松涉过,以至尼克松、基辛格都不得不赞扬他是世界一流的外交家。他在谈判中有时委婉含蓄,有时攻势凌厉,方法多样,百变无穷。如在一次谈判中驳斥前苏联霸权主义者说“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时,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地斥责对方:“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二件事情,比如说从捷克斯洛伐克或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

领土,难道要把中国长城以北统统让给你们,才算我们赞成缓和世界局势,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吗?”这样事实确凿、语言干脆的斥责,使苏联霸权主义者当即哑口无言,显示了口才在谈判席上的威力。答记者问和其他一些外事活动也是施展口才的重要场所。抗美援朝时期,周恩来总理妙答美国记者围绕派克钢笔提出的挑衅性问题堪称经典。一名美国记者看到周恩来总理的桌上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讥讽的口气问:“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何还要用我们美国的钢笔呢?”周恩来总理当即庄重而又风趣答道:“提起这支笔,话就长了,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给我的。我无功不受禄,就拒收。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收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这一绝妙无比的回答征得美国记者哑口无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社会,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三大标志是什么?以电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水平,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生活富裕程度,以公共关系为代表的经营管理效能。而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又是重中之重。构成现代企业的三大支柱分别是技术、管理和公共关系。可见,公共关系是现代组织开拓经济、谋求发展、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由于公共关系的形成途径是传播、沟通活动及其行为规范,所以公关与口才的关系极为密切。公关人员除了具备较多的专业技能之外,还必须具备较高的口头表达能力。可以说这是当今口才运用领域的新拓展。公关人员的口才主要表现在交际、演讲、论辩和谈判等方面,贯穿整个树立形象、建立信誉、沟通信息、提供决策、协调关系等等公关过程。

社交往来中的思想交流同样不能低估口才技巧的巨大作用。因为善解人意、切中要害的得体话语,可以平息争端、消除误会、和解矛盾、融洽关系;几句体贴入微、委婉曲达、和风细雨的话语可以使人解除烦恼、冰释忧虑;而幽默诙谐、谈笑风生的语言可以使人

轻松愉快、忘却疲劳；急智奇思的巧言妙语可以使人摆脱僵局、化险为夷；中肯的建议、剀切的批评能使人内心感动、心悦诚服；热情洋溢、真知灼见的演说能给人以启迪和鼓舞。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甜言蜜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出言不逊，语言粗鲁，就很难与他人和谐相处，也很难拥有自身的吸引力与亲和力。因此，无论是夫妻之间、异性之间、朋友之间，还是老少之间、同事之间、陌生人之间，都要讲究说话的技巧；不论是寒暄、表白、说服，还是拒绝、批评、赞扬，都要注意语言的艺术。一句话，要增强自身的吸引力、亲和力，使人们乐意与你交往，乐意接受你的意见。因此，当今口才具有联络感情、融洽人际关系的社会功能。

口才在科技文化推广中的广泛运用，也是当今口才发展的一大特点。当今世界正处于科技文化飞速发展、广泛普及的时代，发明创造、高新技术、尖端科学、学术会议，甚至专利展销等等无一不与口才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杰出的数学家陈景润，早在1965年就已证明出哥德巴赫猜想，由于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不强，论文的表达不够简洁，整整修改了八年，才在1973年得以正式发表，一颗璀璨的科学明星由于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的欠缺，推迟了八年才得以在数学界的天空升起。而一心只想用农业技术来战胜饥饿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历次国内国际水稻研究科研会上以其杰出的口才将其杂交水稻的科研成果推广到全国、走向全世界。因为口才与科技文化推广的关系密切，所以当今科学界出现了许许多多长于口才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其中著名的有华罗庚、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茅以升、李四光等，还有著名的科普工作者如高士其、王谷岩、童裳亮等等。他们运用驾轻就熟的口才技巧或作学术报告、或作科技演讲、或介绍发明创造，让科技成果及时得到推广，收到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三节 口才在司法领域的应用

从司法角度而言,好的口才是正确运用和执行法律,保证法律实施的有效手段。自从社会有了阶级、国家和法律后,就有了司法口才。我国司法口才的萌芽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人们把口才作为治理国家、理案断狱的工具,并注意到司法口才的研究。在不少文献中,不乏有关司法口才的精辟论述。如我国最早的散文集《尚书·吕刑》记载:“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意思是说,老百姓之所以服法而接受治理,没有不是由于听讼者能以正直之心全面听取争讼双方的讼辞。《尚书》中亦有“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单辞”之语,就是讲现在上天治民,设立人君配合天德,对一方没有对质的单方面讼辞要审查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由此可见,在西周早期人们就比较注意司法口才了。《周礼·小司寇》还记载有“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做法:“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意思是指审判官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言辞、语气、声调、表情、眼神、姿态的变化,推测分析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并根据当事人的心理、言语和表情来确定自己说话的内容和方式,以求查明案情,正确断案。这说明古代司法口才已经非常注重方法和技巧了。又如《墨子·小取》中提出:“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子的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口才在司法工作中的重要性。另外,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专于辞讼的我国最早的律师。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郑国大夫邓析,素好刑名,而且口齿伶俐,能言善辩,能“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否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并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不仅说明邓析是我国最早的律师,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巧言善辩的司法口才家。

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古人虽然对司法口才不乏深刻的论述,却只是零敲碎打,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社会重人治而轻法治,法制不健全所带来的后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受生产力的限制,民主程度低,科学不发达所致。而当今中国以“依法治国”为方略,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健全,这就要求我们尽快解决司法领域中的各种理论问题,其中就包括司法口才理论。加强对司法口才的研究,总结归纳各种司法口才的规律、特点和应用技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高司法工作者的说话能力和口语水平。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除了要立场坚定,思想正确,法律精通,业务精湛外,还必须具备善说会写的能力。据粗略统计,每办一起案子,有百分之六十的时间是在说。询问证人、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调解治安纠纷,宣传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违法人,都离不开说。这就需要司法工作者在口才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自己的说话水平。

第二,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询问、讯问、调解都是法定的必经程序,目的在于发现和收集各方面的证据,使各种证据能互相印证,互相检验,从而查清全案,扩大线索。而询问、讯问和调解的主要形式是言语。法律工作者言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办案的效率。法律工作者言语技巧高则能迅速突破言语对象设立的防线,解决矛盾,一举获胜;反之则会久攻不下。法律工作者只有通过学习司法口才,熟练掌握进攻与防御、随机应变、出奇制胜的言语技巧,才能提高办案效率。

第三,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法制的建立和健全,一是要根据客观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二是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三是要提高全体公民(包括司法工作者)的法律意识。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一系统工程中,办理案件要运用口才,宣讲法律要运用口才,教育违法人员要运用口